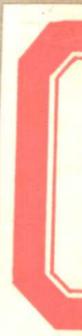


167-35

李樹青著

天竺遊踪記

胡適題



李樹青著

天

竺

遊

踪

瑣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91835)

天竺遊踪瑣記一冊

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李樹青

發行人 朱經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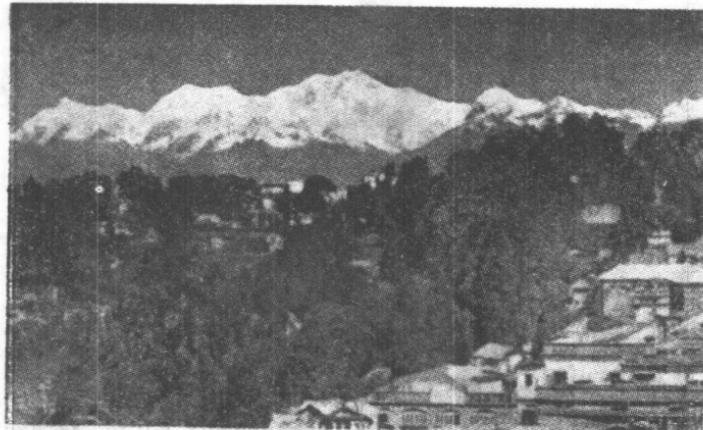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印務刷印書廠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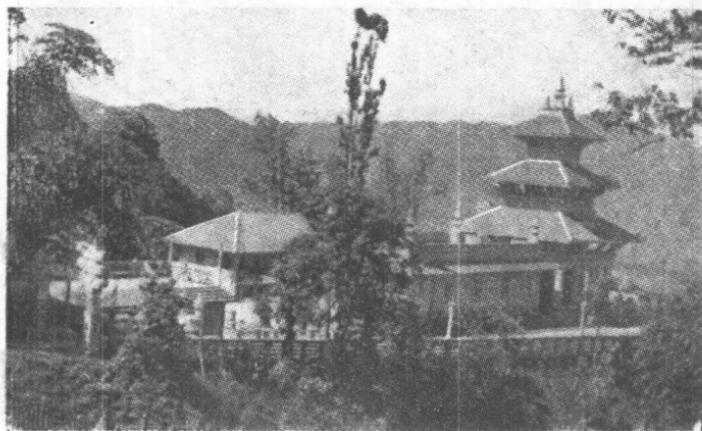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印有究所必\*\*\*\*\*

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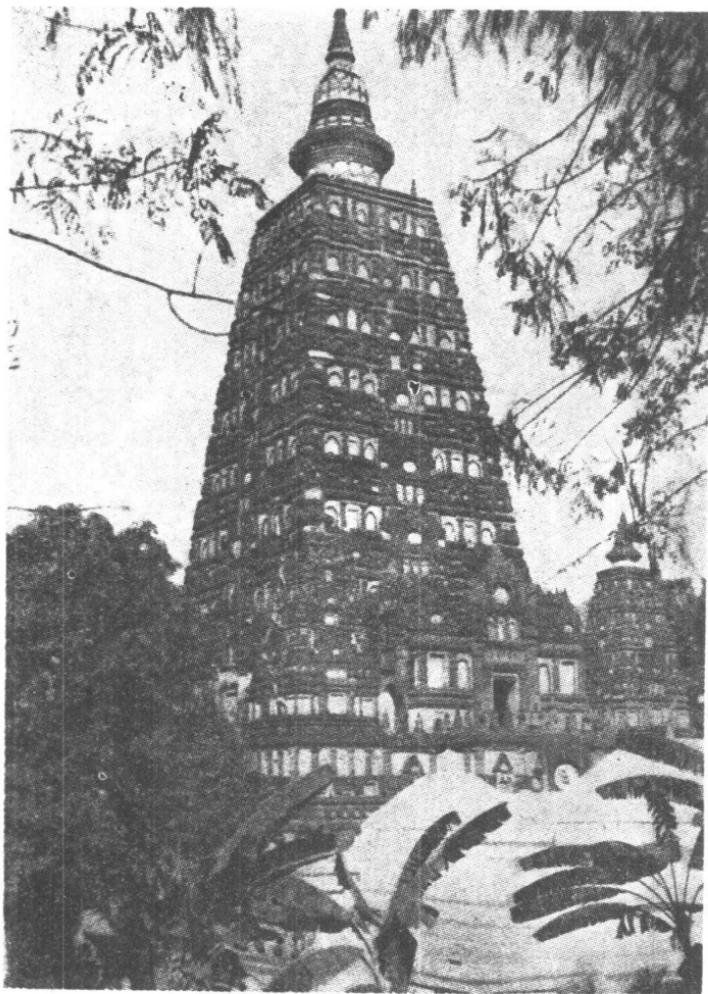


從大吉嶺望喜馬拉雅山



大吉嶺寺院

1914/10/14



塔念紀道得佛尼牟迦釋——蹟古耶伽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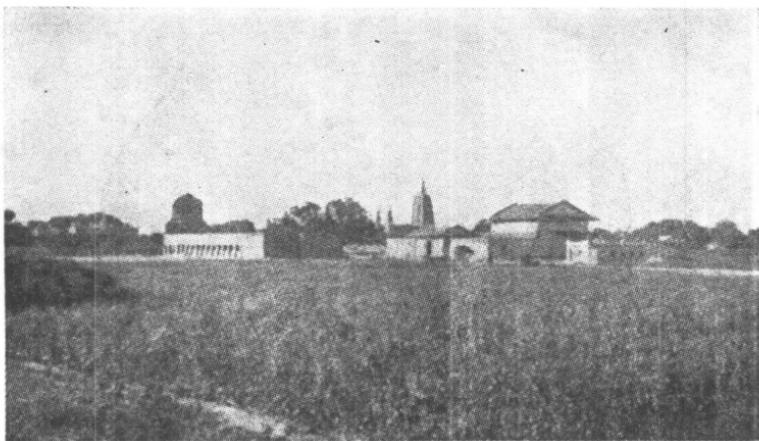
印 度 古 大 覺 寺 塔 碑

塔建印度佛成道菩提樹側東邊距伽耶城南二十里

碑立菩提場圍牆外摩訶老道廟內東壁上現不許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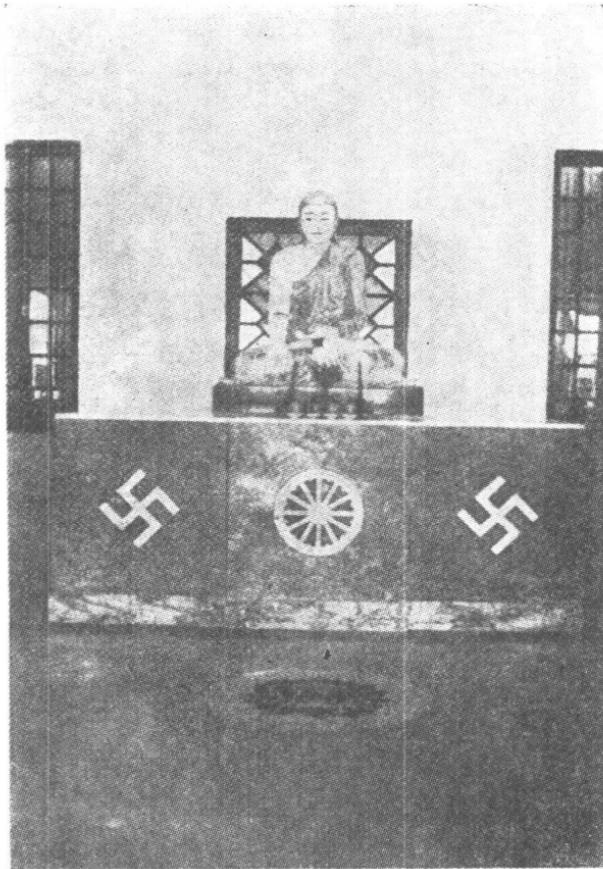
贈印度永釋增建募寺覺大華中場提菩度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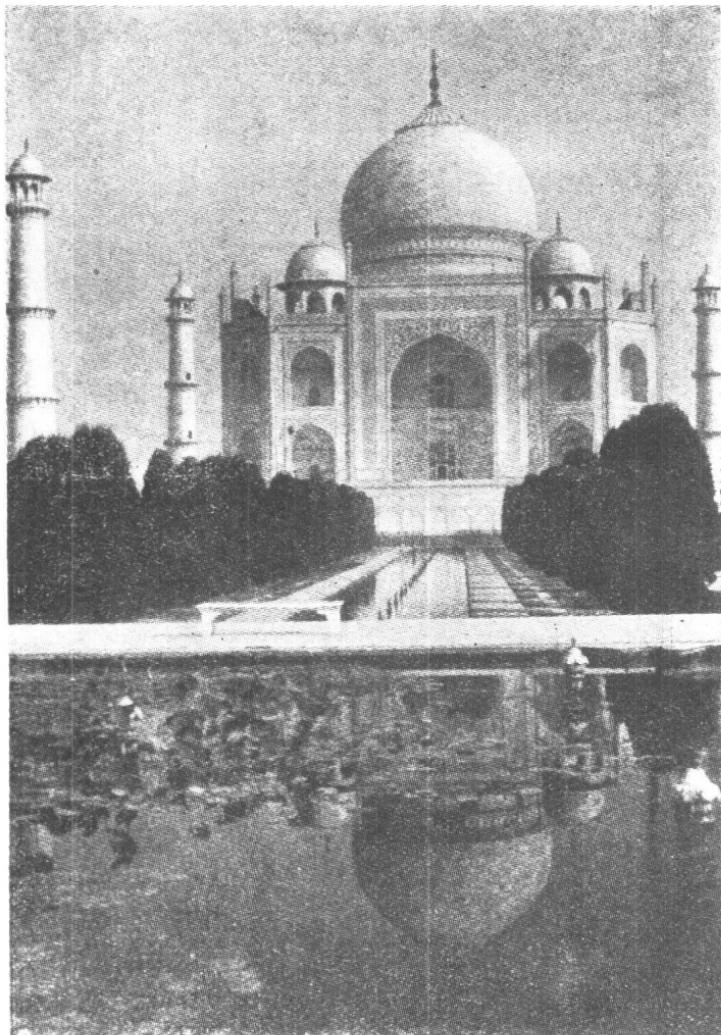
印 度 鹿 野 中 菩 華 寺 全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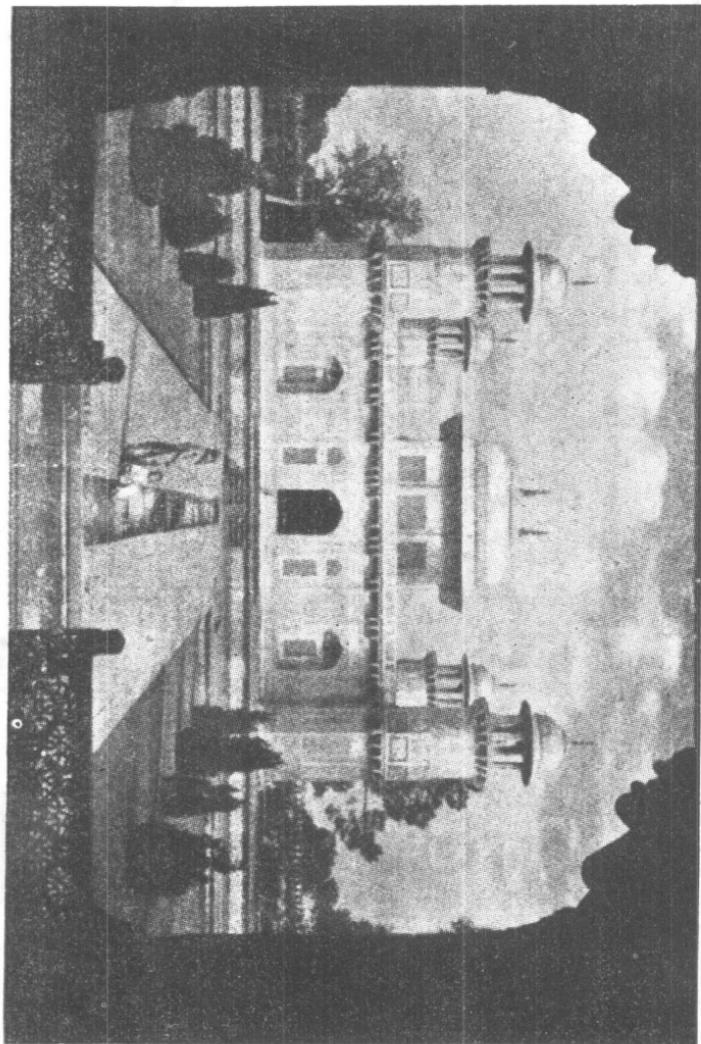
印 度 鹿 野 中 菩 華 寺



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



哈嗎吉大



「國之棟梁」

玄奘法師像



# 自序

猶記在兒時喜歡翻閱家中的藏書。每次翻閱，祖父便諄諄告誡着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西遊。』意思說。不要我在年紀未達成熟時期去閱讀家裏那部《西遊記》。當時我雖時常聽祖母講述《西遊記》上的故事，也不斷看見過舊年時在壁上粘起嶄新的有關《西遊記》的畫圖，但是仍舊不曉得這部書的全部內容講些什麼。直到十四歲時，祖父下世去了，我這纔有機會打開了祖父的書桌。把久已想看的《西遊記》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讀後的全部印象早已不復記憶，只有一點，到目前尚十分清楚的，便是我那時也想到西天去取經去。因為有一個時期在家內吵着要去出家做和尚，後來很久都成為家裏人向我嘲笑的資料。

兒時的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看隣居的拜佛（菩薩）與念經。我們的家裏因為幾代書香，沒有一個人曾經受過一點佛教的影響，家裏面雖有不少藏書，但都是屬於經書史記以及預備下考

場的八股文與試帖詩之類，也從未有一本佛經。然而鄉鄰裏我們的隣居却顯然和我家不同。他們是良好的農民，勤苦耐勞，節衣縮食，每年都把積蓄下來的一部份金錢，用到燒香拜佛上去。因為兒時的好奇心，我曾經詢問他們為什麼要如此生活，他們說：『要沒有菩薩的保佑，我們怎樣能够得到五穀豐收和生兒育女呢？』我又把同樣的問題一再向我們家裏的長輩詢問。他們說了一些道理，我都不大能够了解。最後我自己所想得的結論是：『我們的家有孔子孟子保佑，用不到麻煩菩薩。』

後來逐漸地使我對我們家裏的保護神發生懷疑了。這大概有兩個原故，使我的信念動搖：第一是我偶然從隣居的孩子去到佛教的廟宇時，我看到廟裏面香煙縹繞，燈火通明，祭台上陳設着的供品之多，粢盛之富，令我驚異。同時並有成羣的善男信女跪在殿堂裏面，在和尚的木魚清磬與經聲佛號之中，向着佛座祈福。顯然地請佛保佑的人，遠比我家這樣靠孔孟保佑的為多。其次，也是最實際的一個理由，即隣居的日子雖並未十分富裕，卻也並未貧窮；但我們家裏從我能够記憶事情的時候，就在變賣田產來維持生活。這樣，我覺得我們家裏的保護神，不是神通不大，便是未盡責。

任於是使我逐漸地傾向佛教。

在兒童時代的這一點小小的理念，後來使我在讀中學和大學的時期，節省下有限的金錢，去購買佛教的經典。閱讀得愈多，興趣也就愈發濃厚。在不斷地研習當中，我纔了解了所謂佛教並不是兒時隣居所拜的菩薩，而所謂佛經也不一定即係廟內和尚所念的阿彌陀佛；佛經與佛教原來是一套整個人生的看法，一種湛深偉大的哲理。所謂西方莊嚴佛土原不過指的印度，而所謂往西天去取經的人原係千餘年前的一批留印的中國僧伽——這曾經是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留學運動。

\* \* \*

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次留學運動，自六朝隋唐以迄北宋初年，共有五六百年之久。經過這個長時期的中國僧人的努力，不但把印土佛教販來中國，而且加以吸收融化，終於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北宋以後的所謂理學，利用儒家的外衣，包裹佛學的骨髓，可謂為最具體的例證。這批留印僧人在中印文化的溝通與傳播上，真是具有不能磨滅的功績。

然而當時這批僧伽的旅行，却絕對不是一件容易事。陸行者要渡沙河，過雪山，水行者則附商船涉怒海。正如玄奘所謂：『踐流沙之漫漫，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巖峻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大慈恩寺三藏法帝傳卷五）義淨所謂：『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遠命。或亡餐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我們讀這兩段文字，可知當日的赴印留學，雖然不必經歷如西遊記上所說的九妖十八洞以及唐僧所遭受的九九八十一難，但路途的險阻與行旅的艱難，已可概見。

在這批留印僧人中，（據梁任公先生就殘缺不完的記錄計算，確知時代與名姓者共達百零五人，此外尚有佚名者八二人）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是高才俊學與多聞大德，然而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幾位潔出的人物，也正出於其中。例如法顯、玄奘與義淨三法師，他們的旅行記錄，早已成爲舉世共欽的鴻寶，已經有了幾種文字的譯本。就中尤其是玄奘法師，他在佛學上的造詣與其留學時期在印度的地位，自古迄今尚沒有任何一人可與比擬。吳承恩的那部西遊記固然把我們三藏法師的名字，通俗化到婦孺皆知的地步；同時也正由於此，竟使一般知識階級都遺忘了甚至抹

煞了他在文化上的貢獻，這誠屬一側莫大的遺憾！

當然，有的人也許說：這種宗教式的旅行，在其它宗教中也有，並且普通得很。例如耶教徒的朝拜耶路撒冷，回教徒的巡禮麥加，甚至於三家鄉的無識鄉愚，都會不辭辛苦跋涉到普陀或五台去進香祈福；這批佛教徒的遠遊天竺，又何足珍貴？這只是一種皮相的說法。中國僧伽的前往印度，宗教的熱誠固爲其中的一部，但最重要的目的，則係爲求知慾的驅迫，與「正知見」的滿足，換言之，即爲衆生求得無上正法。所以去印的僧人，尤其是著名的幾位法師，在未去之前都有許多待解的問題。既去之後，便卓錫寺院或訪問名師，極力研習與抄寫所需要的經典，後始行捆載數年所得的經書梵本而歸。例如在法顯返國時，因在船舶上遭遇變故，不得不把一切「君婢及澡罐并餘物棄擲海中」，但却「一心念觀世音」，祈求保存住所攜的「經像」。又如玄奘在歸途中渡印度河時，墮失經本五十夾，不得不在迦畢試國烏鐸迦漢禁城停留五十餘日，俟抄畢還，經後始行返唐。而返國後，他們又在努力從事介紹與翻譯。孜孜兀兀，寸陰是競。試問其他朝山進香或瞻拜聖地的信徒，是否曾經有過上述各類研經求法的精神？這幾件外表相似而內容迥異的事情，實不能相提並論。

作者在這裏表章千餘年前的我國留學生，目的並不是要煊染我自己這冊新西遊記。由於現代的交通工具的舒適與便利，我雖然也曾經訪鹿苑，登鷲峯，過王舍城，瞻仰菩提樹下的金剛座；但旅程絕不如昔時之艱險。誠然也未曾遭遇唐僧九九八十一難中的任何一難。用意所在——也可說作者在百忙之中竟然抽閒撰述這冊遊記的宗旨，在以下數點：

第一，我們都知道，從文化的立場而言，自清末以來我們進入了第二個留學運動時代。前一個留學運動是我國僧人向印度研求佛教，而目前這個留學運動則係知識階級向歐美學習科學。前一次留學的任務可謂早已圓滿的完成，而這一次却正在方興未艾。迄目前為止，我們所遭受的西洋文化衝擊與固有文化沒落的痛苦，遠比我們所享受到的在物質方面所改進的幸福，要大得多。這是事實。這類事實，並不能用以維護國粹主義者的根絕西化運動，也同樣不能用以支撐『中體西用』之類的腐僻濫調。為國家爭獨立，為民族求生存，我們生存於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有放寬了心胸，擴清了眼界，用我們的前輩留學生——旅印僧人——的那種研經求法的精神，去學習